



国际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美〕 罗伯特·福特纳 著

华夏出版社
Thomson Learning

北京广播学院指定教材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G206
F75

国际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美〕Robert S Fortner 著

刘利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美)福特纳(Fortner, R. S.)著;

刘利群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8

书名原文:*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ISBN 7-5080-2193-2

I. 国… II. ①福… ②刘… III. ①国际-传播-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256 号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y Robert S. Fortner

Copyright © 1993 b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为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于 1993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Thomson Learning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
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3737 号

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

[美] 罗伯特·福特纳 著

刘利群 译

策 划:刘 力 蔡 翔

责任编辑:裘挹红

封面设计:阿 东 韬 杰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988 16 开

印 张:24

字 数:384 千字

定 价:39.00 元

前 言

国际传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默默无闻地为我们提供方便,不引人注意,又不为人知晓,然而它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关系到商店里商品的供应、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本质以及宗教的规模和范围。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或收音机旁,看到或听到某个国家又陷入战乱,或贝鲁特当局将释放某个人质,这时,我们的确认可国际传播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这种认可可是未加思索的。我们可能会对记者的报道大为失望,也可能憎恶电视上正在播出的情景,但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些图像如何从很远的地方送到了我们面前,或者想一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否也能看到这样的图像。大多数人是看不到这些图像的。我们甚至可能比某个遥远国度的国民更了解他们的政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信息的氛围中,我们可以听广播,看电视(几十个频道之多),阅读报纸杂志,看电影和租录像带,随便拿起电话就可与世界各地的人通话。也许几个简单的事例就可说明国际传播是多么精彩,但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如此精彩。

我在英国时,有个要好的朋友去了几趟美国,回来后惊叹,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的英国下院的情况比他在英国国内知道的还要多。在英国,他只能从晚间新闻中得知一些有关议会会议的只言片语。

有一次,我和这位朋友在芝加哥一起排队买火车票。他突然笑起来,并解释说,他想会有人用枪顶住他的肋骨说:“举起手来。”在他看来,似乎在美国的电影里,每当有人站在有栏杆的售票窗口前排队时,总会有人抢钱。为什么我们的感受会有这样的不同?

我在华盛顿住过5年。期间,我曾应邀为外国广播电台和电信机构来访业务人员作过上百次讲座。我的任务是向他们介绍美国的情况:我们的广电系统或公共传播工具的结构、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运作、我们的新闻工作的准则是什么,以及新闻界如何判定新闻,等等。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解释了美国的诸多复杂的问题之后,总会有人问,我们这个体系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带有偏见的地方报纸使他们困惑,记者充当政府的“监督者”的角色令他们糊涂,上万个广播电台在

空中同时播音的“浪费”使他们难以衡量出利弊。

国际传播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广播和电视是否就是把信号发送到某个目的地,或是用某条消息来吸引受众?国际性电视台的出现是贸易问题还是文化现象?如果我们只想兜售录音带,那么是否应该考虑该国的经济优先项目?新技术应以何种速度发展才能加大国际传播容量,以便拓宽电话或数据传输的渠道?在一国获得的版权是否也应在别国受到保护?富国对信息流入穷国应承担什么责任?所谓的传播权是否是一种真实而存在的权利?西方言论自由的理论是否在全世界都适用?应推广吗?应该由谁来掌握构成国际传播系统的科学技术,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国家垄断,还是国际组织?

准确地论述国际传播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论述的角度可以多种多样。有些论述限于国际传播活动中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主要涉及宣传、跨国公司以及控制电影电视片贸易会带来的后果等。有些则从科技和专业活动的角度来论述,如卫星的作用、国际新闻和广播业惯例以及通讯社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论述集中于某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如世界信息与通信新秩序等。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于人们从某个方面来了解国际传播。这些研究大都较为细致地论述了国际传播的某些方面,而不如本书那样全面。本书将在论及国际传播的具体方面提供一个总的框架,它融合了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和法律规章等方面。本书认为,读者应将国际传播的具体活动视为整个国际传播系统的一部分,还应考虑一个国营和私营企业在追求自身目标的体系中如何达到平衡。本书探讨了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该国对公平分配全球有限资源(经济或技术方面)的立场;论述了为各国广泛承认的通讯自由权如何受到保护,而又如何被有些国家阻遏;讨论了知识产权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保护或遭到破坏。为了能够总括全局,我决定不将内容限于一两个技术问题,而是把所有方面都综合起来。我还决定把对当前国际传播系统持有异议的观点收入文中,让那些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不同立场,认为当今的体系存在着意识形态或经济方面偏见的意见也占有一席之地。

我本人的看法是当前的国际体系虽然纷繁复杂、发展迅速,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国所操纵,特别是被美国控制。尽管西方国家在20世纪末面临着经济困难,但是,与它们争夺权力的对手已然解体,其不同的广电网络系统和独特的视角也随之消失。而发展中国家仍然为沉重的债务、人口爆炸和经济停滞所困扰,所以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建立起不同的体系。一些与西方

相异的体系,如阿拉伯卫星组织和泛非通讯社,虽然仍在运作,但它们往往被经济困难所制约。日本人虽然购买了一些美国大型娱乐公司,但仍然处于边缘地带,而美国的有线电视网、音乐电视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电视机构则在全球迅速扩张。

地球村之说仍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媒体自我标榜的结果,正如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所说,是一种宣传炒作。媒体以及那些运用这一国际体系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继续在全球盛事(如世界杯、奥运会或人道主义演奏会)中愚蠢地宣称电视观众已达10亿甚至更多。我们不应被这些宣传和神话所蒙蔽,而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这个国际体系之外,因为有限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实现这一权利,而各国的经济政策又被国内的统治精英和国外的强权所操纵。

我希望本书能提供一些基本知识,从而使读者能够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任何书都不可能完全跟上最新形势,但是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是会反复出现的。宣传是一个持续不变的问题,虽然其运作方式多年来一直在变化。技术的经济性也是个常存的问题,即使为人们关注的科技将随着时间而变化。对于目前最新的争议问题,读者都可在本书的框架中找到依据。这本书是一个基础,对这些最为复杂和最具争议的问题不作明确的解释。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希望本书读者也对此表示谢意。他们是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格雷厄姆·迈顿(Graham Mytton);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斯坦顿·伯内特(Stanton Burnett);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多弗·斯特林(Christopher Sterling);西北大学的詹姆斯·施沃茨(James Schwach);肯塔基大学的道格拉斯·博伊德(Douglas Boyd);以及休斯敦大学的肯尼思·哈伍德(Kenneth Harwood)。一些工程师、图书管理员、档案员和决策人也都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帮助。他们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美国国家档案局、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和邮电档案局、驻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驻布鲁塞尔和日内瓦的欧洲广播联盟,以及驻巴黎的欧洲宇航局。最后,我还应对在卡尔文大学上我的国际传播课程的18位学生表示感谢。1991年春天,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因为写作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学生。

第 1 章

国际传播简介

为什么要研究国际传播？

约翰·狄韦(John Dewey, 1926, p.166)曾声称,“在所有事务中,传播是最了不起的”,如果他的话正确,那么国际传播无疑是传播中最了不起的事务。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引出一个又一个复杂的问题。国际传播涉及人们所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它还要求人们关注人权、技术和拥有精神产品的权利即知识产权。下面所列清单是国际传播活动的简要实例。

- 曾发起成立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organization, Intelsat)的美国于 1984 年指出,在国际卫星通讯领域展开竞争,将更有利于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政府认为,竞争,特别是北美和欧洲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降低国际卫星通讯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美国对 Intelsat 施压,结果是每一项新的服务都需要根据 Intelsat 的协议与现有体制进行协调。然而,许多国家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它们认为,这种竞争不但将威胁到 Intelsat 的经济生存能力,而且对它们自身的利益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们认为,如果没有 Intelsat,这些国家将得到较差的服务,因为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卫星公司不愿意提供低使用率的卫星线路服务。

- 1987 年下半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派出了一组 FB-111 战斗轰炸机,从英国的基地起飞去轰炸利比亚,以报复卡扎菲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的国际广播电台之一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在这期间对利比亚人播放了一个呼吁,号召他们推翻卡扎菲。反对人士认为,这样一种呼吁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因为国际法禁止使用宣传手段

来挑唆暴力行动,或是干涉他国内政。

- 两名巴基斯坦人在 1989 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如释重负地发现美国人是那么友好。他们告诉我,根据他们从美国生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上看到的情况,他们原本是准备遇到侵犯和暴力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人在创作他们的娱乐节目时,不去考虑他们在国外的观众会如何看待美国。
- 1991 年 8 月,在那场短暂的苏联政变中,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利用一台传真机宣布政变,并向华盛顿求助。被军方扣押在度假别墅内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则靠一台短波收音机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莫斯科的事件进程。其他的消息则由苏联的学者使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通过他们的电子邮递系统传送到西方。

这些实例显示了国际传播系统所包括的活动和事件。通过这个系统,新闻工作者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几乎同步地进行新闻报道;政府利用官方的电台同外国公民进行直接的沟通;个人则使用电话进行交谈,使用传真发送文件,或是检索其他国家的电脑数据库中的信息。这个系统还使得人们可以办理银行业务,进行股票交易,预订国际国内机票,公司可以进行电影及音像产品的贸易。

美国在发展和使用这个国际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美国公民和企业拥有占世界上四分之一强的电话,三分之一的收音机,个人电脑的百分比最高,卫星地面站的数量最多。美国拥有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通信卫星网络,而它出口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占世界第一位,比排名第二至第五位国家的出口总和还要多。它的公民和公司还拥有比其他任何工业民主国家都多得多的专利。此外,美国的国际广播节目时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每年还要耗资 10 亿美元,专门用于从事针对别国人民的信息发布活动。

然而,大多数美国公民却没有意识到国际传播系统对自己国家的意义。例如,1983 年,英国广播公司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美国人认为,短波(shortwave)广播这一国际广播所普遍借助的媒介,是在微波炉中使用的(*BBC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nd Audience Research*, 1983)。

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能从电视上看到国际新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很少考虑远在海外的现场同纽约的新闻编辑室进行联系时会存在困难,也很少考虑记者在报道一则消息时会面临的限制——除非有记者被他国驱逐,或在采访报道时遇害。美国人阅读报纸新闻时,从不重视报道中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AP)、路透社(Reuters)或是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

ternational, UPI)等代号的含义,更不注意节目中不那么明显的提示,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名称是“通盘考虑”。

无知不是福

像美国人那样的无知是不幸的。假定美国的电话系统发展的前提是电话系统的价值直接与能使用自己电话的人数有关,那么,这种逻辑为什么并不适用于那些与美国电话一样多的国家,即使它们较少拨打电话?电话的数量越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也就越多。这样的联系影响着美国的企业处理其国外事务的方式,也影响着人们在听到自然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作出的反应。此外,美国生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外销也影响着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共外交渠道”(主要是官方的广播电台和新闻媒介),借此来影响远方的人民对其外交政策的看法,并让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其他几十个国家,从英国到伊拉克、尼日利亚、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匈牙利和古巴,也对美国进行广播,有的提供信息,有的进行宣传,还有的则向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提供消息。银行经由国际传播系统以电子方式兑换美元和外币,而人们则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全国交易所,一天24小时进行股票交易——这也是为什么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计算机里储存了全球飞机航线的资料,而计算机编程员可以提供软件的外语版本。利用卫星,美国的音乐家可以和别国的音乐家一起从事国际募捐活动;而全世界都可收视到的奥运会等运动比赛,只要有卫星接收器并对准正确的方向即可收看。

美国国民如果继续保持对国际传播的无知,继续保持他们对世界地理的有案可查的无知,或是坚持以本地为核心的本土主义,他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地球臭氧层的损耗,核裁军的进展(或倒退),自由贸易原则的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全球性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将有赖于国际传播系统,有赖于影响政府政策的美国民意。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所以美国公民不可不知世界大事。评论家们甚至将美国称为“最后的超级大国”。负责任地行使这样的权力,需要高素质的国民的积极参与。

建设一个能发挥全部功能的民主国家,同样需要国民的参与。因此,我们必须拥有了解事实真相的选民,他们知道政府正在对其他国家的国民讲些什么,知道政府如何从事贸易以及执行外交政策(见Hutchins, 1947, p. 9; Tuch, 1990, pp. 4, 5)。而这种选民的塑造,取决于美国人民关注国际传播的来源和渠道,关注同这些来源和渠道相关的国际法规的作用,关注对其他国

家人权保护的程度。警觉的公众还应该知道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知道外国人的观念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这样,才能有意义地参与民主事业。国际传播,无论是由美国国民引导的,还是针对美国国民的,都将影响到人们的态度、认识和活动。

国际传播的重要性

大部分美国人对国际传播的运作都毫不知情,因为一般人不易接触到国际传播活动,而这些活动也未能引人注意。比如,人们会全神贯注地观看电视播报的劫机、劫船和发生在驻外使馆的人质事件。当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贝鲁特被劫持,当伊朗发生人质危机及伊拉克出现“人盾事件”时,人们会每晚守候在电视机旁。越南战争之所以被称为“电视战争”(至少在海湾战争爆发前),是因为新闻电影一夜夜地将战争的场面带进千家万户。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able News Network, CNN)几乎成为美国及其盟军进行轰炸时不可缺少的通讯渠道(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也依靠 CNN 获取消息;见 Roberts, 1990)。CNN 还引发了欧洲人希望在欧洲大陆提供同样新闻服务的争论(见 LaFranchi, 1991)。但很少有观众会想到或希望了解到这些国际新闻背后的人和技术。人们已经习惯于翻开日报,阅读有关美国的军事活动、外交活动、外国商家活动等新闻标题,这些新闻通常是以通讯社提供的稿件为基础。人们也很习惯靠看电视或收听广播所作的实况报道来了解诸如首脑会议、皇室婚礼、暗杀和政变等事件的发展,这些事件通常是通过卫星将信号送到全国公共广播网或电视新闻网,若这些新闻未能及时报道,大家就将其归咎于新闻采集部门的工作失误,从而忽略了为这些国际新闻报道最终可以播出所牵涉到的复杂的科技、协调工作和资金等问题。

此外,人们都期望拿起电话就能拨到世界各地或从国外直接打电话回家。人们还期望可以从一个国家电子汇款到另一国家,或拥有世界通用的信用卡。但他们却很少想到,离开了国际传播和国际金融系统,这些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最后,人们还希望本国的所作所为能够被别的国家理解,本国总统的演讲、本国人民对贸易赤字的关注等问题,能够被传送到别的国家,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很难准确解释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当然,通过各国驻美记者的活动和报道,通过美国的国际广播如美国之音的报道,更多的是通过美国有

线电视公司遍及全球的活动,这些解释工作确每天都在进行着。

换句话说,国际传播对美国国民的生活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都很重要,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些事或可以将这些事给予清楚的解释。但是,假如国际传播突然中断,世界各国人民将很快就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状态:国际电话不通了,国际间的股票、期货及金融交易停摆了,国际间的政治、军事行动似乎不见了,在国外居住或旅游的美国公民好像也消失了。全世界似乎骤然变得恐怖起来,所有的人都会变得不可知。传播所带来的信息流通开放的时代将会消失,黑暗和恐惧的日子又将再度来临。

国际传播的起源

国际传播的起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11世纪时,当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国与国之间开始交流之际,国际传播就已经存在了。¹国际传播也可追溯到古罗马、希腊、埃及、巴比伦等古代帝国时期,因为这些帝国幅员广大,具有不同的政治、语言及文化实体,有必要发展出特定的方法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见 Innis,1972)。

已故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殷尼斯(Harold A. Innis)指出,从考察这些古帝国的传播方法,如刻有文字的泥板和碑文、纸草卷、图章戒指和道路等,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古帝国所曾经实施的政权统治方法。他认为,这些传播技术各有侧重,从而使这些古帝国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在这些早期的技术中,石刻和粘土压印是属于时间性的,作为传播媒介不容易搬动,却可流传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纸草是属于空间性的,作为传播媒介便于携带、质地轻、可丢弃。选择属于时间性的传播方法,因其适合于继承、延续,将使帝国传统得以延续。选择属于空间性的传播方法,因其适合于流通,将有利于统治者扩张其地盘,从而形成帝国主义(Innis,1951,pp.3-60;1972,pp.12-115)。这些古帝国的疆域正是今天围绕在地中海的数十个国家,很明显,低估这些政权最早建立的“帝国”传播是不公平的,它们通过传播建立起来的统治与联系的体制无疑已构成一种国际行为。

国际传播的定义

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

进行的传播。人们有时也认为国际传播是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传播,持此观点较多的是研究国际数据交流的经济学家。

但是,上述定义既偏粗略又过于狭隘。根据此定义,两位站在各自国界上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进行的交谈也变成了国际传播,而实际上,他们的交谈只是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的人际交流。此外,此定义也过于狭隘。显而易见,定义中并没有阐述传播的特点。那么,传播是否也包括一封由加纳寄往英国的信件,或是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打到利马的长途电话?或者说,它只包括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组织例如 Intelsat 的活动?

本章旨在清楚地定义什么是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活动包括我们以后要综合讨论的具体的条约、组织和事件,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的特点

国际传播共有六个显著特点。事实上,尽管这些特点并不能完全界定究竟哪些交流是国际传播,但它们却可以为评估具体活动提供重要标准。根据这六个特点,传播业务也在国际传播之列。

掌握这些特点可避免简单地理解国际传播。例如,人们很容易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由跨国传播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构成,也易于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国际新闻传送(因此不包括非新闻性内容),或认为主要是信息交流而带来的经济影响,而将国际声讯、国际传真或电传的活动排除在外,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对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只集中在其中一个单独的方面,这显然妨碍了对这一世界现象的全面理解。因此,本书要讨论的国际传播标准尽量避免过于狭窄的理解,然而,本书也无法包罗万象,毫无遗漏。因此,讨论的重点为**电子**传播方面,包括广播、电视、声讯、传真、电报、**电传**(telex)、卫星、数据和新闻内容。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非大众的(如外交家间的)交流,将不进行重点讨论。此外,对于电影或报纸发行,本书虽然会偶尔提及,但将不作专门分析。

那么,国际传播的特点究竟是哪些呢?

目的性

国际传播既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即传播既可以有意地跨

越国界,也可无意地超越国界进行。例如,美国之音或俄罗斯电台等一些以外国听众为目标的国际广播电台显然是有意的国际传播,而加拿大或墨西哥接收到美国电台和电视台的溢波信号,或加勒比海地区接收到美国国内通信卫星(domestic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DOMSAT)的溢波信号,也属于国际传播。与敌对的政治阵营有意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传播相比,这种溢波(无论是在陆地还是通过卫星进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²对无意接收到溢波信号的国家来说,这种溢波可以影响到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当国家得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援助时,或面临像德国统一前西德对民主德国的政治威胁时,这种溢波信号所导致的影响更深。

频道

国际传播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有的**,公共传播是指大众可以接收到的传播。显然,广播电视就是公共传播,虽然其频道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国际高频短波(shortwave, SW)广播电台使用公共频道,这些频道并未分配或保留给私人使用。³目前,通过私有频道(或为非公共使用而保留的频道,如某些需要特定的解码器或可以调谐特定频率的接收器的专用频道)进行的公共传播尚未具备广泛的用途。同理,国内传播的应用也只能通过特殊接收器才可接收到电台的信号。⁴使用国际**直播卫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s, DBS)传送信号是较适合的国际传播方法,印度已试验使用美国 ATS-6 卫星进行传送,⁵该系统需使用小型卫星接收器调谐信号。

但是,私有传播可达到的受众有限。通过公共频道进行的私有传播包括通过海底电缆或跨国通信卫星而收发的电报和电话。通常情况下,为了防止目标受众以外的人士了解其内容,这种传播需要经过**加密处理**(encrypted),其内容往往涉及军事或贸易秘密、金融信息和非公开性的私人资料。

同时,私人传播也可以通过私有频道进行。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NC)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工厂或各个销售部门取得联络,专门租用卫星转发器,各国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此外,通过加密处理,防止了私人信息被他人窃取。因此,通过对私有频道的使用进行加密处理和限制,这种传播受到了双重保护。在这两种情况中,内容(无论加密与否)可能相同,区别在于频道所有者将服务提供给私人还是组织机构。

传输技术

在国际传播系统中,信息的传播渠道可以是**无线电波、电线电缆**,或者是**影碟、录音带和录像带**。无线电波传送的是陆基广播和电视信号以及连接上行和下行通信卫星和卫星地面站的微波信号。⁶电线电缆利用缠绞双束铜线、同轴电缆或光缆传送信号,这两种传播形式的本质区别是其传送的信息种类不同。无线电波多用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传输,而电线电缆等多用于点对点的传播。公司和政府机构则利用船只或飞机运送录制的资料,以便在其他国家进行非法或合法的复制和再传播。

内容形式

国际传播可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娱乐、公共事务和由国际广播机构传播的新闻节目;由国际电讯机构如美联社或路透社传送的新闻原始稿;由国际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公司提供的计算机数据和软件;由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AT&T)等传送的声讯和电报业务;通过军事频率为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这样的组织传送的加密信息;以及使馆之间交换的外交信息等。国际传播形式还包括需要经过特殊收发设备和电子地址所进行的传真和电传业务。

文化影响

所有传播都是象征性的活动,因而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强国可以通过国际传播系统将它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包括新闻价值、社会道德和政治经济理念)强加给比较落后的国家(见 Schiller, 1971, 1976, 1989; Mattelart & Schmucler, 1985)。国家之间的争议在于有些国家试图保护其自以为源远流长的文化(或博大精深的)习俗及交流方式,有些国家则认为这些习惯不利于跨文化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交流的权利(见本书第8章)。

政治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传播可以公开带有政治性质,也可以隐含有政治色彩,或者只是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

响。但是,国际传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即使某些特殊组织,如国际宗教广播电台,虽然通常不以针对政权为传播目的,但仍有其政治性,这是因为政治因素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是因为不加控制的信息威胁到了知识垄断这一政权统治的基础(见 Innis, 1951, pp. 35 - 38; Carey, 1989, pp. 149 - 156)。

公开的政治传播 公开的政治传播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之音及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其宗旨是以美国或苏联的官方观点来发布观点或分析世界局势,即所谓的**宣传(propaganda)**。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将宣传定义为“经过细致挑选的并带有偏见的……[信息],以期能教化、改变和影响信息接受者……”。⁷宣传还包括“假信息(disinformation)”,即散布错误信息,由驻外媒介进行收集和报道,然后由国际广播电台和通讯机构进行再传播。尽管苏联的假信息传播经常成为美国抱怨的对象,但美国本身在1991年2月在科威特发动地面反攻之前也使用假信息来误导伊拉克。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举行高级会晤,美国新闻署署长查尔斯·Z. 威克(Charles Z. Wick)要求苏联保证停止针对美国所进行的信息误导。1988年1月9日,美国新闻署声称,发现苏联正在使用假信息的伎俩来策划新的活动,它指控美国正在“研制一种生物武器来消灭某一宗族或种族的人”。上述报道源于加纳的阿克拉(Ottaway, 1988b),并在整个非洲地区流传。

隐含的政治传播 隐含的政治因素对联合国举办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产生的影响较多。这些活动包括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COPUOS)就有关缔结条约进行的讨论,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会议中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ITU批准的会议筹备组的活动等。隐含的政治因素还会影响到联合国各专门组织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的其他活动,或一些委员会如研究传播问题的一些临时委员会的活动。尽管这些组织和委员会表面上与政治无关,但其工作进程和议题却会受到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如何综合考虑各国情况,使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的利益与经济比较贫穷、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正是通过这些讨论和协商,国际组织才能为诸多通讯社分配**电磁频率(electromagnetic frequency)**,为**卫星轨道(satellite orbital slots)**或**卫星信号溢波(spillover)**确定管理规则,为新的传播服务如**高清晰度电视(high-definition television, HDTV)**或

改进型电视(advanced television, ATV)制定技术参数,并且为信息与传播时代的国家主权保护论提供保障。而政治责任、联盟和敌对行为无疑不仅影响了上述讨论的书面结果,而且也被视为非政治实体如 AT&T 或国际商业广播电台的活动产生了影响。

政治和经济政策 或许最难定义的就是对国际传播构成冲击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国际传播施加影响。在广播和电视领域,许多国家对电子设备的进口实行限制。这些限制的形式包括实行进口配额制,征收高额关税或其他税费,或全面禁止产品进口。尽管从保护外汇储备或从外汇储备匮乏的角度出发,上述措施有其合理性,但这些做法也限制了购买广电设备以便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可能性。近年来,由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难以偿付巨额外债,这一问题更趋严重,许多于 20 世纪 60 年代(廉价的晶体管收音机时期)进口的无线电接收设备在 20 年后的今天已无法投入使用,而新型的接收设备因价格昂贵而难以进口(见 Fortner & Durham, 1986; Fortner, 1991c)。

在电讯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难题,许多国家在电讯往来上规定了有利于国内或地区间往来而不利于远距离的国际电讯往来的歧视性价格政策,征收跨国公司的税费并限制长途通讯。然而这些政策并非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一些国家提出了平等参与或签订允许私有网络与国际接轨的合作协议的要求。

上述广播及通讯政策确实使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增加了收入,并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活动提供了必需的硬通货。但是,这些政策也限制了这些国家的公民接触外界的机会,特别是那些贫穷和孤立国家的国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府的控制。国际传播在这些国家还未形成气候。例如,在偏僻的地区,除了通过用电池作动力的收音机外,那些没有电话或没有电的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界。但是如果没有电池,他们连收音机都无法使用。随着世界银行为通讯发展提供贷款,随着录像机(videocassette recorder, VCR)和电池动力电视机的出现,以及家用卫星接收器的建造,由来已久的传播障碍已开始逐渐清除。

国际传播与政治历史

如前文所言,国际传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为了便于分析,本书仅以 1835 年作为追溯国际传播史的起始年代,原因如下: 1837 年,电报试验

成功,1840年,法国开始使用光学电报系统,并在其国境之内建立高塔,以旗语在全国范围内传送信息(见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1965, pp.11-16)。1844年,美国已启用电报系统,同时,铁路正在各国普遍铺设,为此要进行国际协商以促进国际间的交通往来(见 Czitrom, 1982, p.6;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1965, p.29)。火车、轮船和电报加快了国际新闻及金融的流通步伐,也增加了人际间的交流。这些技术也加强了帝国资本对发展中的帝国的控制(见 Andrew, 1857, p.140; Briggs & Maverick, 1858, pp.21,22; Burt, 1956, p.435; Kalb, 1990, p.x)。

19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开始讨论建立国际传播系统,各国领袖们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必须发展。科技及其带来的后果,为宣传提供了制造大量受众的动力,并使新闻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考虑因素,也使全世界的经济更加紧密联系成为一体。

为了便于理解,本书将国际传播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835—1932年;1933—1969年;1970年至今。每一时期又依其间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来细分。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并非十分确定,有些事件的发展甚至是跨年代的。

1835—1932年:国际会议期

该时期是国际传播技术发展的初期:电报(1837年)、海底电缆(1866年)、电话(1876年)、无线电(1897年)和广播(1907年)纷纷出现。⁸20世纪20年代,利用无线电波进行点对点通电话的技术已取得重大发展,国际无线电广播已开始运行。由电的使用而引发的传播问题,导致第一个国际公约和第一个与传播相关的组织——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 ITU)于1865年诞生。⁹在20世纪初,新兴的无线电技术也取得了相似的发展。1912年,“泰坦尼克”号巨轮海难发生后,许多国家签署了一份国际协议,要求所有船只在工作时必须配备无线电设备及训练有素的操作员。各国无线电管理机构之间也开始接触,并于1903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尽管从未正式作为国际组织而存在,但仍享有国际无线电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Radiotelegraph Union)的盛名。1932年,国际电报联盟和无线电电报联盟合并,成立了国际电信联盟(ITU)。1906年,国际间还制定了无线电公约,规定无线电管理的基本准则,如各频道的分配和使用方法,哪些是政府可使用的频道,哪些是远距离的传播所使用的频道等等(见 Headrick, 1991, pp.120,121)。

上述努力的目的是要促进国际传播的发展。例如,1865年在巴黎签署